

大学排名是如何诞生的

文/凯西·奥尼尔 译/马青玲

我们整个社会不仅认同了大学教育是必不可少的这一观念,而且欣然接受了排名靠前的学校的文凭能帮助学生快速进入特权阶层这一事实。《美国新闻》的排名模型以由此而生的恐惧和焦虑为养分,成长为一个庞然大物。排名模型有力地刺激了各方在教育上的不断投资,而飙升的学费则被忽视了。

这个故事开始于1983年,美国一家濒临停刊的杂志《美国新闻》决定开展一个规模庞大的项目:评估全美1800所学院和大学,按优秀度为这些学校做一个排名。如果进展顺利,这个项目的成果会成为一个有用的工具,可以用于指导数百万年轻人做好人生中第一个重大的选择。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个选择将决定他们的职业道路、终身的好友圈,通常还包括终身伴侣。此外,杂志编辑也希望这个大学排名项目能带动杂志销量——

没准在推出大学排名的那一周里,《美国新闻》的销量能追上《时代》和《新闻周刊》呢!

但是,要基于什么数据进行大学排名呢?起初,《美国新闻》的工作人员完全依靠他们寄给各大学校长的调查问卷所得到的反馈结果进行评分。结果,斯坦福大学位居全美综合性大学之首,阿默斯特学院则是排名第一的文科学院。排名结果虽然很受读者欢迎,但也令很多大学的校领导非常愤怒。杂志社收到了排山倒海般的投诉,内容都是控诉

排名结果有失公正的。许多大学的校长、在校学生和已毕业的校友坚持认为自己的学校应该获得更高的排名,杂志社应该再去仔细研究一下有关的数据。

接下来的几年,《美国新闻》的编辑一直在思考他们具体可以测量什么数据。许多模型诞生了,但其中大量的评估因素仅仅来自直觉。模型确立的过程并不严谨,统计分析也缺少根据,模型建立的依据仅仅是人们凭空想象的对教育而言最重要的

因素,然后,去寻找可以测量的相关变量,最后随意地在公式中赋予每个变量一定的权重,模型就完成了。

在大部分领域,模型确立的过程通常是比较严谨的。比如,农业学科的研究者会比较投入(土壤、阳光和化肥)和产出(收获后,具有特定特征的农作物的产量)。然后,他们就可以按照目标,比如一定的成本、口感或者营养价值等进行下一步的试验和优化。但是,《美国新闻》的编辑所做的是“教育优秀度”排名,这是比粮

食成本或者每个麦粒的蛋白质含量更加抽象、模糊的价值。这些编辑没有直接的方法来量化4年的大学学习过程是如何影响某一个学生的,更不用说数千万个学生了。他们不可能测量一个学生在4年大学生活中的学习、幸福、信心、友谊等全部方面。美国前总统林登·约翰逊对高等教育的定位是:“高等教育是深化自我实现、扩大个人生产力和增加个人回报的途径”,但不

(下转11版) →

← (上接9版)

么可以想见,明天的美国也将不得不在社会和政治方面为“两个美国”可能导致的恶果付出沉重代价,为此,帕特南发出如下警示:“阶级之间的鸿沟不仅会危及美国的繁荣,而且会破坏我们的民主,甚至是我们的稳定。”(《我们的孩子》,第269页)

富家子在畅想未来,从容构筑他们的诗和远方,而穷孩子连眼前的苟且都不可得,更别说对未来的希望。

克林顿港的“大卫”,18岁,从童年开始,父母离异,家庭破碎,居无定所,父亲酗酒、吸毒,最终因抢劫被关进大牢。由于无人照顾,大卫沦落为社会盲流,打架斗殴,结交狐朋狗友,寻衅滋事,一度被关进少管所。在访谈中,帕特南和他的团队发现,大卫并非一般人想象的那种无可救药的坏人,事实上,他对九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怀有强烈的责任感,他渴望家庭的温暖、父母的关爱,但这些对他来说实在是过分的奢望。雪上加霜的是,大卫的女友意外怀孕,生下一女后弃他而去,而且后来发现这个孩子不是大卫自己的,即便这样,大卫也欣然承担起对孩子的监护责任。或许是因为面对访谈,大卫要故作男子汉的坚强,强作镇定,但生活对他来说实在是一部“狗血剧”,孤独焦虑,不堪重负,暗无天日,他要求不高,

命运却对他如此吝啬,几无生存下去的希望,他在Facebook上的一次状态更新反映的才是他的真实心境:“我总是人生输家,我只想再感受下完整的生活,为什么却一错再错!我对生活竭尽全力,但却一无所获。完了……我他妈的真完了!”(同上,第33页)

俄勒冈本德镇的“凯拉”,她生在一个家徒四壁、一贫如洗的家庭,全家依靠父亲打零工勉强度日,凯拉有五个兄弟姐妹,要么同父异母,要么同母异父,属于典型的“拼盘家庭”。父母离异后,各自再婚,凯拉跟着父亲,艰难度日。然而祸不单行,父亲中途又患重病,凯拉不得不承担起照顾父亲的重任。当初父母离异给青春期的凯拉造成巨大的心灵创伤,她性格变得孤僻自闭,抑郁症状表现日趋明显,她怀疑生活,怀疑他人,对凯拉来说,“这个世界变幻莫测,难以驾驭,充满恶意。……在她的人生中从来没有过稳重可靠的长辈。‘好像我的人生一直在走下坡路,生活的一切都在瓦解、崩溃’”(同上,第67-68页)。

还有在亚特兰大北城一座破败的购物中心里干打包杂物体力活的“伊利亚”,还有加利福尼亚橘子郡的“罗拉”和“索菲亚”姐妹,还有住在费城最危险的街区肯辛顿的“丽莎”和“艾米”姐妹,还有……这一幕幕出身工人

阶级家庭的美国年轻人的生命悲歌,绝非作者刻意筛选出来以博取布尔乔亚们同情的素材,而是一场遍及全美的“美国噩梦”来临的征兆。作为读者,我们尽可以怀疑作者选择讲述案例的所谓“客观性”,但那些关于美国贫富分化、阶级隔离的冷冰冰的统计数据却不会骗人:“从克林顿港到费城,从本德镇到亚特兰大再到橘子郡,家庭之间的经济悬殊是每段故事的关键情节。每段故事各有不同,但不变的是令闻者伤心,甚至感觉到危机将至的伏线:下层阶级家庭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但与此同时,上层阶级的父母却控制着越来越多的资源。”(同上,第255页)

《我们的孩子》与我们

《我们的孩子》是一曲由诸如大卫、伊利亚这样的穷孩子们生存境遇合成的命运悲歌。帕特南的笔调温暖而不失理性,通过讲述那些穷孩子们令人心碎的人生故事,帕特南绝非意在暗示富人道德上的冷漠、批评政府的无能、谴责所谓社会的不公,更不是要将危机的源头归咎于单一的责任方,而是条分缕析,从诸如婚姻家庭、学校状况、邻里社区等各个不同的角度,揭示导致阶级隔离和机会鸿沟在美国愈演

愈烈的纷繁复杂的社会根源。帕特南洞察到危机的伏线,同时不放过任何人性的光辉,改变现状的希望:出身拉美裔移民家庭的“克莱拉”和“里卡多”夫妇,青少年时期曾在贫民窟度过,个人的不懈努力,加上幸运地得到学校老师的加持鼓励,克莱拉得到良好的受教育机会,作为第二代移民,他们已经完全摆脱了上一代的困境,成功攀登至中上阶层。也许出于自身的人生经历,克莱拉对女儿的教育可谓不遗余力,但这位典型的拉美裔“虎妈”并没有忘记那些出生在贫困家庭、成长于危险社区的孩子们,如今克莱拉是一名儿童社工义工,在她眼里,那些孩子同样也是“我们的孩子”。这位妈妈可不是如今一般的富人的做派,而是作者在20世纪50年代记忆中的美国家长:他们认识到每个人都不是一座孤岛,他们深知养育一个孩子,需要举全村之力,需要美国社会中那些幸运者向那些不幸者施以援手。或许援助者力所能及的付出,就足以帮助诸如大卫、凯拉、伊利亚、米歇尔、罗拉和索菲亚、丽莎和艾米们摆脱困境,改变他们的人生轨迹。

美国人所奉行的绝非如人们惯常想象的所谓“坚定不移的个人主义”,事实却是,每个人的潜力只有在家庭、邻里、社群的守望相助中才能得到发挥甚至放大。

为此,帕特南提醒我们,美国民族的创业史更准确的形象应是“一列马超队伍,上面满载着同心戮力的边疆拓荒者,他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同上,第232页)。《我们的孩子》正是要在个人主义风潮已经占据上风并渐成压倒之势的时代,让更多的美国人认识到危机的根源,唤醒他们的道德和社会责任,它不仅在通过学术表达以揭示病源,更在于提出有针对性的行动路线,号召人们正视危机并及早行动起来。

对于美国人和中国人来说,过去40年的历史叙事似乎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基调:一个显得疑虑重重,踟蹰彷徨,一个显得高歌猛进,自信满满。对于《我们的孩子》所诊断的“美国病”,我们毫无理由作壁上观,甚至幸灾乐祸。要知道,所谓的“美国病”绝非“美国的病”,它毋宁是典型的“现代病”,它正在困扰美国,帕特南开诚布公,直面问题,寻找解救之道。他的学术勇气、智性的真诚以及面对复杂的现实问题时的谦卑,难道不值得同样作为学者的我们自我检视?不宁唯是,《我们的孩子》还为我们提供了一面透镜,通过它,我们或许能够更加清楚地审视各种社会肌体。

《我们的孩子》属于美国,又不仅仅属于美国。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